

清华简《系年》所见两周之际史事说

○ 代 生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清华简《系年》记载了两周之际的重要史事,如“周亡王九年”和两周间势力变迁等问题。由于史料不足,学者对此仍有不同解读。综合史籍记载看,周平王最终成为“正统”,但他对携惠王并不认可,因此称携惠王时代为“无王”;“周亡王九年”指携惠王九年,在此年许多诸侯由拥立余臣转向拥护平王,秦、郑等也可能加入了这一行列,这是两大阵营分化的关键期。《诗经·雨无正》等篇章反映了两周之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通过《系年》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时人的思想状况。

[关键词]《系年》;两周之际;幽王;平王;携惠王

清华简《系年》篇是清华大学整理公布所藏战国楚简的第二批(册),全书共 23 章,所载史事从西周建国一直延续到战国初年,涉及晋、楚、秦等诸侯国,内容丰富。《系年》发表后,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两周之际的历史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兹先将有关内容移录如下(释文用宽式):

周幽王娶妻子西申,生平王。王又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界,缙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骹,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骹。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1]

作者简介:代生(1981—),烟台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学术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古文字与出土文献。

这两章叙述了周幽王宠爱褒姒、废太子宜臼、被申侯联合西戎攻灭,以及幽王死后携惠王和平王二王并立、平王东迁的事迹,可与《国语》、《竹书纪年》和《史记》相参照。其中年代排列和诸侯势力变迁的问题,对我们了解两周历史及年代等有重要意义。该篇自公布以来,前辈时贤有过很好的分析,但部分观点笔者认为尚有可商之处,不揣谫陋,试对有关的问题作粗浅讨论。

一、也说“周亡王九年”

简文提及的“周亡王九年”,整理者认为“周亡王九年,应指幽王灭后九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对此做了说明:

《系年》里之所以称“周亡王九年”正是因为如《纪年》里所说,携王本非嫡,因此幽王死后,携王被虢公立,然并未被众诸侯邦君所承认。平王也是如此,虽为太子,且被一些诸侯拥立称为天王,然地位处境也只是与携王一样,所以《纪年》称“周二王并立”。一直到幽王死后九年,因为晋文侯、郑武公、齐襄公、卫武公、鲁侯等众多实力强大的诸侯拥护周平王,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平王正式被认可为周王,接续幽王。^[2]

以上见解,陆续有学者提出质疑。如刘国忠先生认为“更应该理解为晋文侯杀携惠王之后,周曾出现了长达9年的亡王状况。如果这一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在周幽王死后,先是出现了携惠王的政权,携惠王被杀后,又过了9年时间,太子宜臼才被晋文侯拥立为王,平王即位已经是幽王辞世30年以后的事情了,如果这一记载可信的话,当时可能并没有出现‘周二王并立’的局面。”^[3]陈剑先生也持类似看法。^[4]

王红亮先生认为:“在周幽王三年(即公元前779年),周幽王很可能在将伯盘立为太子之后,即立其为王,所以当时诸侯的史书载‘周亡矣’,《系年》将其称为‘周亡王九年’的开始。”同时还提出另外一种可能,即“‘周亡’王指周幽王,古人习以亡国之君称‘亡王’”。^[5]

魏栋先生则将“周亡王九年”句读为“周亡。王九年”,指出“周”指携惠王之周,“王”指周幽王,“九年”是幽王九年,“并据以考定周平王即位不是在公元前771年,应该在公元前774年或773年,建元及东迁则应在公认的公元前770年。”^[6]

晁福林先生最近也刊文进行讨论,认为“亡”应读为“无”,“从幽王之死到携王被杀首尾十一年,掐头去尾,正是‘九年’之数。简文的‘始不朝于周’,当是统称此无王的‘九年’,不是指无王的第九年。”^[7]

学者的解读,无论哪种都与传世文献所载有所不同,可见《系年》记载对两周史事研究的重要价值。但综观诸说,我们认为上述多数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先看刘国忠等先生的看法,如果周王(包括携惠王)已死,朝中没有掌权者,邦君诸侯自然不会朝周,又何必在“周亡王九年”“焉始不朝于周”呢?这难以解释。而且从平王即位时间上看,若“平王即位已经是幽王辞世30年以后的事情了”,

文献记载平王在位达五十年,两者相加跨度太长,这种可能性极小。

《系年》说周幽王被杀,“周乃亡”,《国语·晋语一》记载说“申人、郟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两者相同,都是记载西周灭亡。王红亮先生据《史记·周本纪》“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认为此时为“周亡王”并不妥当,伯阳的话是预测和感叹,而非对往事的记录,此事又见《国语·周语上》“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史记》所载是袭自《国语》,所以“周亡矣”指“周将亡”,这是史家预言而不是陈述史事,因此我们绝不能据此拆分幽王纪年为两段。王先生的另外一种看法也似难说通,因为在史书记载中,虽然有称亡国之君为“亡王”者,但并没有以此纪年的,况且上引《系年》记载对周幽王的记述始终是“幽王”或“王”,这里多出一处“周亡王”来称呼幽王显得十分突兀。

余臣虽然被“立二十又一年”,并有谥号曰“携惠王”,但从《系年》“周乃亡”可知,他是不被承认的。这里的不被认可并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所说的“未被众诸侯邦君所承认”,《系年》明确说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可见余臣最初得到了邦君诸侯的扶植,他实际上是不被后来成为正统的周平王所承认(详下文讨论)。就接续幽王王权来看,只能有一个“合法”继承者,那就是平王。幽王为西周末王,平王为东周始王,余臣的地位自然十分尴尬。故而不存在魏栋先生所说的另外一个“周亡”,况且他将“王九年”理解为幽王,那《系年》先记载幽王死后携惠王即位的事件,再追记幽王九年时平王即位,不符合逻辑顺序。

晁福林先生的看法虽然新颖,但是“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焉始”是一个起点,这一起点从哪里开始?我们认为还应该是某个年份,不是一段范围,否则平王“三年,乃东徙”也失去了时间参照点。

综上所述,有“王”的存在,诸侯才有可能朝周并达九年之久,这一王还应是携惠王,所以《系年》“周亡王九年”当是周幽王灭后九年,也即携惠王即位九年。

二、两周之际的势力变迁

以上讨论是否得当,还有待于学界的检验。如果此说成立,可以厘清一些困扰历史学界已久的疑问——两周之际诸侯的立场问题。

(一) 秦的政治转向

两周之际的周秦关系,《史记·秦本纪》记载甚详:

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嫡,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郟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

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这里说犬戎伐周幽王而秦襄公救周,同时平王避犬戎难东迁,襄公以兵送之。犬戎既伐周幽王,又逼迫平王东迁;秦襄公既亲周幽王,又辅助平王,他们到底属于哪一阵营?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并怀疑太史公所记的可信性。如钱穆先生说:“《史记》不知其间曲折,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8]“秦戎本世仇,戎因周乱而踞丰镐,秦入则因周室之东而侵地自广,所谓救周有功,赐地封侯云云,则未必尽信史也。”^[9]蒙文通先生也说:“《秦本纪》言,秦襄公将兵救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之。襄公救周则党于幽而敌于平。犬戎党于平而夺平地,秦敌于平而平封爵之,皆事之必不然者。”^[10]

王玉哲先生在以上学者讨论的基础上认为:

那时矛盾的双方,敌我阵线如此分明,绝不能混淆。秦助周幽王以抗拥护太子宜白的犬戎、申侯之兵,而宜白就是申侯、犬戎这一方所拥立的周平王。则犬戎之与平王,是友而非敌,可是《秦本纪》却说周平王避犬戎难,东徙洛邑;秦之与平王是敌非友,而《秦本纪》却称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送其仇而平王封其仇,其矛盾难通,罕有如此者。

据此王先生提出平王东迁不是避犬戎难而是避秦的说法,^[11]此说在学界影响甚大。晁福林先生则另辟蹊径,从秦与戎世代为仇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幽王被杀后“秦襄公根据携王托庇于戎人的情况,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为申、鲁、许等诸侯所拥戴并且与戎人联系较少的天王”,^[12]即周平王。这一看法具有启发意义。

导致学者争议不断的根源,是史料的匮乏。《国语·周语上》说:“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语焉不详,只说明是相互接续的事件;司马迁著《史记》,能够搜集的资料更少,因此他将幽王死和平王东迁系于一时,引起了学者的质疑。

《系年》记载恰可以回答上述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可知,两周之际形成了两大利益集团,一股是支持幽王、携惠王的势力,一股是支持平王的势力。从幽王三年平王奔西申开始,直到携惠王被杀,两大集团对立了近三十年。其间,两大集团间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分化倒戈的。《系年》说幽王死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如李学勤先生指出:“‘邦君’是诸侯,‘诸正’是朝臣,这表示余臣立为王有相当多的支持,不是只有虢公翰一人。”^[13]于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但九年后,即“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这个时候两大对立阵营明显分化:诸侯朝余臣,体现的是对他的拥护和对其王位的认可;不朝余臣,则是“离心离德”,体现了对余臣的舍弃。这时晋文侯审时度势,“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所以原来一些拥戴余臣的诸侯倒向了平王这里,笔者以为,这正是两大阵营势力的转折点。由于史料不足,《史记》缺载了幽

王死后一直到平王东迁这十二年时间的史事，诸侯倒戈的情况也未能记载，所以显得矛盾重重。

弄清了这段史事，则可知秦襄公在周幽王之时，可能确曾“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随着两大阵营势力的转变，尤其幽王死后九年诸侯倒戈时，秦襄公也随即倒向平王，所以又发生了平王东迁时“襄公以兵送周平王”的事情。出于此点，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即《系年》所载“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秦在两周之际的政治选择和转向由此可以知晓。

（二）郑的政治转向

郑在两周之际的处境如何？《国语》记载郑桓公被幽王封为司徒，其子武公受平王重用，但没有说明郑桓公晚年及郑武公继位初年的情况。《史记·郑世家》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认为郑桓公站在幽王一边，最后被杀。这一观点多为学者引用。

但是，周平王东迁依靠的是郑国和晋国的势力，依照学者的观点，郑国势力的转变不会如此之快。所以沈长云先生考证郑桓公并没有死于幽王之难，相反，他及时转向了周平王一边：

余甚怀疑桓公自与史伯谈话之后，即转而投向与幽王对立的申侯、宜臼一边。《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前言平王东迁之时，西周携王尚立，是郑于此前已不任西周官职，而与于平王宜臼也。《左传》隐公元年又曰：“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史记·郑世家》亦言：“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申乃幽王敌对集团之谋主，郑、申二国能在东周初年结为婚姻，则郑在此之前政治立场昭然可知。^[14]

司马迁将幽王之死与平王东迁系于一时，引起了学者的质疑，沈先生将郑国势力的转向提早到了幽王死之前，正是基于司马迁误记提出的解释。由于文献阙如，郑桓公是否转向平王集团已经不得而知，依照《系年》来看，很有可能是郑武公在“周亡王九年”根据形势变化而转向了平王一方，所以他才能“亦正东方之诸侯。”

当然，沈先生的推测也是有可能成立的，《系年》说：“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界，缙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细察文义，可知缙国在周幽王起师时是站在幽王一边的，后来转向了西戎。《国语》史伯和郑桓公谈及的“缙与西戎方将德申”，当作此解。郑国也可能是这样，在战争伊始就及时转向平王一方。到了郑武公时代，“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国语·晋语四》）。文献不足，我们可将这两种观点并列看待，但无论如何，郑国的转向不会晚于“周亡王九年”。

如上所论，幽王死后平王和携惠王两大集团仍有较长时间的对峙，清华简《系年》恰反映了两大集团势力消长的过程，其中“周亡王九年”即携惠王被立第九年，是两大集团的转折阶段，秦、郑等诸侯都应是在这一时期转向平王阵营的，

平王得势并被视为“正统”。如此再来读《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载“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郟鄏。”我们则能深刻体会其中的内涵，更可知“诸侯替之”与其间的势力变迁。

三、两周之际的思想状况

通过对《系年》的解读可以知道，两周之际的政治态势比传世文献所载更为复杂。首先，从周幽王、携惠王势力与平王势力的对峙时间看，携惠王称王二十一年，加之幽王与宜臼的决裂时间，两大势力对峙长达三十年之久；携惠王与平王“二王并立”也至少有十二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曾子问》），两周之际这种政治形势带来的不仅仅是战争的灾难，更是心灵的震动和创伤。

再看王位继承。幽王废宜臼，立伯盘，破坏了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后来幽王死，王位传携惠王余臣，以往多认为是由父传子，据《系年》可知并非如此，余臣是幽王的弟弟，平王的叔叔。而周代王位的继承主要是父死子继，余臣被立，在其兄幽王被杀的情况下看似合理，但幽王之子宜臼尚在，理应传子，况且幽王昏庸才导致国灭，宜臼处正义一方；不过幽王早与宜臼决裂，若幽王在世绝不会同意传位于宜臼，何况宜臼背负着“杀父弑君”的罪名……凡此种种，可以看出该由谁继承王位，都是矛盾重重。其实这也是当时“邦君诸侯”争议的焦点，是他们面临的两难抉择。因此，邦君诸侯在长达三十年的对峙中游离于两大集团之间并根据形势而转舵。

再者，戎族侵周，是为外患，是平王集团造成的；戎族侵而不退，两大集团都不能据守故地，携惠王只能到虢地称王，而平王也无奈东迁，这其实是平王“悔不当初”的。引戎入周正加剧了局势的复杂程度。

而面对混乱的局面，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阶层多表现出无所适从的状态。这在幽王时代已经表露无遗，如担任幽王卿士不久的郑桓公，就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打算“另谋出路”，开始转移家产并向史伯询问家族的归宿和去向。相关的思想史资料，《诗经》保存较多，前辈学者也有过精彩论述，如上引晁福林先生《论平王东迁》^[15]一文从王权观念的角度对时人的精神状态进行了解析；尚永亮先生从国家政治层面和家庭伦理层面解析了《小雅》中《白华》、《小弁》等作品。^[16]这些讨论将政治形势与《诗经》文本相结合，向我们展现了时人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特征。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使我们确切地认知两周之际的史事，以此来解析《诗经》相关篇章，能更好地揭示其中的深刻内涵。

以《雨无正》等篇为例，晁福林先生已经指出这是二王对峙时代的诗。分析其义，可知其首章“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是言幽王昏庸，故天降饥馑，以示警戒。第二章“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说明幽王已亡，描述的是邦君大臣的表现。从《系年》可以看出，平王、申侯等联合西戎攻周，占据

王都，幽王臣下作鸟兽散，而这时，虢公在其地拥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携惠王；平王依托母舅之族，同样势力庞大，与携惠王形成对峙局面。两大集团，该投奔哪方？对于这些王公大臣来说，是将身家性命当赌注，因此他们多是在保证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所以《雨无正》第三章斥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此情此景，这批贵族也不是坦然处之，而是惶惶然不可终日，处于恐惧和忧患当中，“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可谓真实写照。事实上，这些邦君诸侯的行为，影响了携王与平王对峙的局面，他们的选择无疑会导致“天平”的倾斜，从《系年》看，邦君诸侯最初还是将“宝”押在了携惠王那里。

对自身利益的“过度”担忧，自然会无暇外顾，更不会关注民间疾苦。所以第四章言“戎成不退，饥成不遂。曾我瞽御，僇僇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听言则答，潜言则退。”如此情况，“凡百君子”因而不肯也不敢出来劝谏。这里的“戎”字，学者多释为“兵乱”，或应指入侵的“戎”族，^[17]他们在名正言顺的理由下“入侵”，却久久“不退”。

上博简《孔子诗论》说“《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18]关于此句，晁福林先生指出：

这两篇诗作亦如《十月之交》等诗一样，没有将抨击指向周王，而是痛心于“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希望周王听取善谋“以畜万邦”。两诗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那些对于周王朝不忠的大臣卿士，他们在周王朝危难的时候表现出自私与虚伪，《诗·雨无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不再以敬奉周王为事。简文谓“王公耻之”，其所感到“耻”的内容除了王位纷争以外，主要即在于此类大臣卿士的丑行。^[19]

晁先生所论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系年》所述当时情势，无论是被虢公拥立的携惠王，还是被申侯、晋侯拥立的平王，他们只是暂时取得拥护；对于邦君诸侯而言，他们实际上是被动的，有时甚至如傀儡一般，难以作为。《节南山》“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即指此，因此《雨无正》、《节南山》等篇多指斥“邦君诸侯”。但换一种角度看，这些篇章言“上之衰”，本身就是一种批评，君权与臣权是互为消长的，君无能，臣权自然上升。王公所耻，并不专指大臣卿士，更是对君王面对外敌不敢作为，面对内政不能作为的指责，因为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王公大臣希望出现一位强势的君王早点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

《雨无正》体现了邦君诸侯的踌躇彷徨，是因为他们面对携惠王和平王两大对立“君王”，选择哪方，都关系到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牵涉到自己宗族的兴衰。所以他们不再将注意力放在挽救周王室之上，而是处处保护宗族利益。关于这种现象，朱凤瀚先生有很好的总结：“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天子被同姓亲族奉为宗子，此种天子与同姓臣属之宗族观念曾长时间地作为周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但到了……西周晚期，宗族的观念、宗族的情谊只在贵族家族内部被强调，为各世族保存自身、发展自身之实力服务，实际上已由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转化为促使西周王朝衰败的催化剂了。”^[20]由此可知，两周之际邦君诸侯的

“莫肯朝夕”和“各敬尔身”，对宗族利益的关注甚于国家，正是周王朝衰败瓦解的表现，这不仅加速了周王室这座大厦的倾覆，也使得东周的政治结构发生转型——王室衰落而诸侯坐大，《系年》“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就是表现。

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界关于两周之际尤其“二王并立”时诗的创作背景和年代都有较大争议。以往学者根据史料多认为幽王与平王东迁时间相隔较短，政治形势也并不复杂，因此许多诗篇是否作于“二王并立”时，难以判断。而据《系年》可知两大集团对峙多年，朝野上下可谓“苦不堪言”，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无疑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探讨某些诗篇的创作时间，为诗经研究提供可以凭信的资料。

注释：

- [1]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38-141页。
- [2]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清华〉（二）讨论记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2月23日。
- [3] 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香港浸会大学“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2011年11月30日。
- [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研读劄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2月31日。
- [5] 王红亮：《也说〈清华简·系年〉的“周亡王九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2年1月12日。在网站回帖讨论中，王先生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认为“‘周亡’王指周幽王，古人习以亡国之君称‘亡王’”，此说后成文以《清华简〈系年〉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为题发表在《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 [6] 魏栋：《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及相关问题探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2年7月3日。
- [7] 晁福林：《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
- [8]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8页。
- [9] 钱穆：《西周戎祸考》（上），《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69页。
- [10]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21、15页。
- [11] 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7-364页。
- [12][15] 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 [13] 李学勤：《从〈系年〉看〈纪年〉》，《光明日报》2012年2月27日，第15版国学版。
- [14] 沈长云：《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考》，《文史》第4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 [16] 尚永亮：《上古弃子废后的经典案例与经典文本——对宜臼、申后之废弃及〈诗经〉相关作品的文化阐释》，《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
- [17] 陈子展：《诗三百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2页。
- [18]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 [19] 晁福林：《从王权观念上看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及时代》，《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 [20]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0-411页。

〔责任编辑：钟 和〕